

纪念郑子瑜先生
受聘北京大学客座教授

文学 修辞 教育

郑子瑜学术讲演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 修辞 教育:郑子瑜学术演讲集/龙协涛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6

ISBN 7-301-02476-2

I.文… II.郑… III.演讲-中国-现代-选集 IV.1267

书 名:文学 修辞 教育:郑子瑜学术演讲集

著作责任者:龙协涛编

责任编辑:胡双宝

标准书号:ISBN 7-301-02476-2/1·317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出版部 2502015 发行部 2559712 编辑部 2502032

排 印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25印张 230千字

1995年6月第一版 1995年6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12.00元

序

一九八九年五月，中国文化书院召开了一次纪念“五四”七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会中晤见香港来的郑子瑜教授。后来子瑜教授又寄赠所著关于黄遵宪的论文，读后深受启发。最近又获睹子瑜先生的论著多篇，方知子瑜先生不但是研究黄遵宪的专家，而且学识渊博，成就宏卓，益增钦佩！

子瑜教授又是修辞学专家，著有《中国修辞学史稿》，在海内外享有盛誉。我对修辞学是门外汉。惟忆读《周易大传》，其中《乾卦·文言》有“修辞立其诚”一语，这是我平生服膺的格言之一。所谓诚？诚即言论符合实际，一方面符合客观实际，一方面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吾人治学，志在追求真理。真理就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人各有所思，人各有所言。所言表达其所思，即表达了其真实情感。“修辞立其诚”，不仅是一个修辞学的命题，而且是关于认识论的哲学命题。谅子瑜先生亦以为然也。

子瑜先生最近将五十年代以来的学术演讲编为一集，其中包含关于文学、史学、哲学、修辞学的论述多讲，内容丰富宏深，颇多新意。子瑜先生讲学的地区是很广阔的，既讲论于新加坡、香港、日本，亦讲论于北京、厦门、上海，莫不受到听众的欢迎。这也是令人钦佩的。

学术演讲集编成，子瑜先生征序于予，于是略赘数语，以表示敬慕之意云尔！

张岱年序于北京大学

自序

现任北京大学学报编审龙协涛教授,于1990年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访问、研究。龙先生在中文大学的八个月中,除完成了他的研究任务外,还以青暇,为我辑集了一册墨缘录和这一本学术演讲集。前者得到龙先生的推荐,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者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个中也有一段值得一叙的缘由。

1992年4月,我受聘为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当时龙先生曾对我说:“先生1986年受聘复旦大学顾问教授,海内外著名学者竞相提供论文,复旦大学宗廷虎教授为之汇编成为一本煌煌大著——《名家论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以纪念这一盛事。如今北大聘请先生为客座教授,何不将先生的学术演讲集加以增订,交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以志又一盛事?”复蒙北大校领导、北大出版社主事人以及张文定、胡双宝诸先生的重爱,使得龙先生的这一动议能够实现,我真觉得自己不应该有这样的荣幸。

关于书名,龙先生说,他与出版社的朋友商定为:“文学 修辞教育——郑子瑜学术演讲集”,主题中三个词儿虽未能概括本书的全部,但却已提示了绝大部分的内容。古人有云:“言不尽意”,姑从之。

现在责任编辑胡双宝教授来信要我写一篇简短的自序或前言。我所想说的就是:自1955年5月12日所作的第一篇讲辞《文学得揜紧科学的手》起,直至1993年3月16日在北京大学东方学系为该系教授、讲师而作的报告《关于中国修辞学史的研究》止,大部分的讲辞都是在业余写成的——因为这三十年中,我除了六十年代初在东京早稻田大学任客座教授,七十年代末在东京大东

文化大学任讲座教授以及自1984年至今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任客座教授之外，其余大部分时间，都是干那非学术性的工作，以致工作不能与学术研究相配合，不得已剥夺了我的游息和睡眠的时间，偷工减料地用最速成的方法来写，才能写下那些不成东西的东西，而又以非学术人士的身分，却在学术机构或学术团体来演讲。如今收入在这集子里的，每一篇讲辞都是保存原来的面目，以存其真。但我不想借此理由来要求读者不要深责我的大部分讲辞之疏忽和浅薄，因为没有机会在学术机构工作也正是我的本领不如人的缘故，还有什么好说呢？

我得感谢北大哲学系教授兼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张岱年先生为本书撰写序文，只是他的过誉之辞却又使我无限的惭愧。

一九九三年四月七日
郑子瑜序于香港

目 录

文学得挽紧科学的手	
——1955年5月12日在马来亚广播电台学术讲座的广播辞	1
郁达夫的南游诗	
——1955年10月22日在新加坡南洋学会的演讲辞	7
谈“文学的绘画”	
——1959年3月25日在新加坡艺术学院学术讲座的演讲辞	15
利人主义的墨子思想	
——1959年9月3日及10日在新加坡	
广播电台学术讲座的广播辞	19
儒家的伦理学说在现社会是否还有提倡之价值	
——1960年4月23日在新加坡华人青年会学术讲座的演讲辞	25
马华文学的历史应该远溯上去	
——1960年10月8日在新加坡文化馆为马来西亚	
社会学研究院举办的学术演讲会而作的演讲辞	31
论周氏兄弟的杂事诗	
——1962年4月17日在日本东京中央大学的演讲辞	37
论周氏兄弟的新诗	
——1962年4月24日在日本东京中央大学的演讲辞	50
黄遵宪与日本的关系	
——1962年4月27日在日本东京汉学会及	
大东文化大学研究所的演讲辞	62
中国修辞学的变迁	
——1964年5月30日在东京早稻田大学	
为日本中国语学研究会的演讲辞	75

关于黄遵宪诗的笺注及其佚诗	
——为纪念黄遵宪先生逝世六十周年而作	
(1966年4月23日在新加坡南洋学会的演讲辞)	104
日本的汉学研究	
——1980年6月19日在新加坡文化研究会的演讲辞	113
日本教育界的工作态度	
——1981年8月29日在新加坡南洋商报社的演讲辞	121
论《史记》修辞之偶疏	
——1981年10月9日在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演讲辞	131
台湾的修辞学研究	
——1985年6月9日在上海复旦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	
与华东修辞学会合办的学术讨论会上的演讲辞	136
编写《中国修辞学史稿》的体会	
——1985年6月在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与复旦大学的演讲辞	144
郁达夫与鲁迅	
——1985年9月在富阳县纪念郁达夫	
殉难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演讲辞	159
从日本明治时代的修辞学研究说起	
——1986年6月10日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演讲辞	162
在复旦大学授予顾问教授证书仪式上的讲话	
——1986年6月14日	172
谢希德校长的讲话	174
甲骨文谈修辞记载的发现	
——1986年6月14日在上海复旦大学的演讲辞	177
论先秦诸子的修辞技巧	
——1987年5月25及31日在厦门大学、	
广西民族学院的演讲辞	187

学习古汉语的目的与古汉语的修辞	
——1987年6月7日在厦门大学的演讲辞	197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黄遵宪	
——1989年5月1日在北京纪念“五四”运动 七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演讲辞	204
我的治学经历	
——1989年5月6日在北京清华大学 思想文化研究所的演讲辞	221
谈中日文人的赠答诗	
——1990年8月4日在北京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的演讲辞	230
在姚美良先生捐赠复旦大学“陈望道修辞学基金” 仪式上的讲话	
——1991年1月7日	246
谈写作教学	
——1991年3月9日在香港商务印书馆举办的中学 中国语文教学之新探讨座谈会上的演讲辞	248
在北京大学授予客座教授证书仪式上的讲话	
——1992年4月25日	256
罗豪才副校长的讲话	258
关于中国修辞学史的研究	
——1993年3月16日在北京大学东方学系为该系 教授、讲师而作的报告	260
郑子瑜主要著作目录	280
编后记	龙协涛

文学得挽紧科学的手

——1955年5月12日在马来亚广播电台学术讲座的广播辞

“文学得挽紧科学的手！”这意见并不新鲜，十余年前，顾均正先生就曾提倡过，可惜没有人响应。

科学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分别。文学得抓紧社会科学的手，这是已经不在话下的了；本文要讨论的是，文学得抓紧自然科学的手。记得曹伯韩先生说过：“文学和科学不同的地方，并不是文学是感情，而科学是理智的。没有通过理智的感情和混沌的。”郭鼎堂先生也说过：“我们生在这科学的时代，谁可以不懂科学？”弄文学的也不能例外。

从前有些文人，每喜谈狐说怪，欺骗读者：一部《幼学琼林》，简直是集迷信之大成（后人补作的便较有科学根据了）；而神仙剑侠的电影和连环图画，更不知误了多少人家子弟！我们祖传的非科学的东方思想，使人很糊涂；我们要不糊涂，便不可以不懂科学。

其实，我们先前，早已经有一些懂得科学的哲学家、文学家了。只可惜的是，我们一些不长进的后辈，不能把他发扬光大，却偏要拿他们的一些玄妙的道理，哗啦一通。譬如那反文明的老子和庄子，大家知道他们曾经激烈地主张过什么“绝圣弃知”啦，“捭斗折衡”啦，可是在庄子的作品里，我们也可以找到很合乎科学原理的话：“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不就是今日数学上所谓“无穷级数”的定理吗？唐朝李华的“吊古战场文”，虽然也有过很迷信的“……往往鬼哭，天阴即闻”的句子；但在同一文里，我们却可以看到很合乎科学的话：“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

宋朝的苏洵，在他那有名的“辨奸论”里也有过“月晕而风，础润而雨”的话，都是有他的科学根据的。近人王国维在他传世之作的《人间词话》里，引稼轩中秋饮酒达旦，用“天问”体作《木兰花慢》以送月的词：“可怜今夜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景东头。”说是“词人想像，直悟月轮绕地之理，与科学家密合”。

稼轩即辛弃疾，是南宋时的大词家，生于1140年，死于1207年。浅学如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卫星之说传至中国究竟起于何时；但我们的辛稼轩，却远在七八百年前，已知道月球绕地运行的道理了。

地圆之说，也不知道究竟起自何时，大约当是确立于十五世纪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环绕地球而航行一周之后。但在中国，自从我们那所谓“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写下了“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见《祭十二郎文》）的名句之后，到现在已经有一千多年了，“天涯地角”，还是不断地有人用它，也不问与地圆之说是否相吻合。我们对于这一类的语句，却不能呆看。譬如“天涯地角”，只能作两地相隔的遥远解，不是真的有什么天边和地角的。又譬如李白的诗句，说什么“白发三千丈”啦，什么“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啦，我们也不要相信他白发真的有三千丈那么长，头发早晨才如青丝一样，黄昏时便白得像雪那样的了；前者不过是形容发白而长，后者不过是形容发白的快。头发由黑变白，是需要经过长久岁月的渐变，然后才能突然——绝不会在一朝一夕之内便猝变而成的。更譬如岳飞的《满江红》词，起句便是“怒发冲冠”，也是夸大的形容词，我们至多只能作怒气之盛看，而事实上，不管怎样的“怒发”，也决不会“冲冠”的。

韩愈的文字，尽管常常有不合科学的，但他对于死后的有知无知，却总是存着个疑问：“死而有知，其几何离？其无知，悲不几时，而不悲也，无穷期矣。”（见《祭十二郎文》）到了清代的袁枚，仿《祭

十二郎文》作《祭妹文》，更直说“死后之有知无知，与得见不得见，又难卒明也”。这在现代人的眼光看来，是已经不成为问题了。所谓“鬼”，更是无稽，记得鲁迅先生在绍兴中学教书的时候，便有过一段皮鞋踢鬼的故事：

他的家和学校的距离颇远，中间有一条近路，是经过义冢堆的。有一天晚上，在学堂里弄得时间迟了，回家时，心想走那一条路好呢。决定仍走近路。两边草长得很高，忽地望见正面有个白东西毫不做声地停住着，而且渐渐变为矮小，终于成为石头那样不动了。他当时有些踌躇，这样深夜，会有人在这样地方行动，大约是所谓“鬼”吧？对于这恶物的袭来，是“进攻”呢还是“退却”呢？短时间的决定：还是冲上去，而且走到白东西的旁边，便用硬底皮鞋先踢了出去，结果那白东西呵唷一声，站起来向草丛中逃去了……他后来讲到这趣事时，笑着说：“鬼也是怕踢的，踢他一脚，就立刻变成人了。”（见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

可见所谓“鬼”，不过是人假装的。

许地山先生在他的《扶乩迷信研究》一书里，更用科学的方法，解释所谓“鬼”的成因：“常人每在幽暗的地方，或夜里见鬼。除掉幻觉错觉以外，一部分可以用后象作用来解释。在瓜棚底下，灯光如豆，疲乏的农人于日间工作之后坐在那里闲谈。其中有一人忽然见鬼影从远而来，或向他方逃去。这是见鬼的故事的一个典型。稍微懂得心理学，或生理学底便知视觉有后象作用。后象所现的色彩与实物为相反的比色。如实物是暗色的，后象便是白色的，实物是红色的，后象便是绿色的，实物是黄色的，后象便是蓝色的……余类推。在瓜棚下自以为见鬼的人或看着对谈的人太久了，后象作用强起来，忽然望外一瞥，他眼里的后象便落在所望的地方，随着他眼睛的移动，就像有人影在移动着。他心里本有一种鬼的观念，一看到这里，当然是断定见了鬼。”（88页）

这“后象作用”，我们可从看电影时得到证明：往往第一幕的人物已经映过去了，第二幕的人物早已映了出来，可是银幕上分明还

有第一幕的影子残留下来。这便是对第一幕看得太久了，后象作用强了起来，再看到第二幕的影子时，便将眼里的第一幕的后象落在所望的第二幕的影子的地方。可是一会儿那所残留的第一幕的影子便消逝了。

我们弄文学的人，消极来说，最少应该抛弃一切非科学的迷信的词语；积极来说，更应该多多创造些合乎科学的词语，有系统地把所理解的人生问题表现出来。

文学，古今的界说不同：古人所谓文学，是指“文章博学”而说的；墨子《非命》篇以为，凡所发出的言谈，都是文学的道理。这样看来，连哲学、史学……等等也都可以算是文学了。至于今人之所谓文学，乃是专指表达作者的情意、以反映社会生活、使读者起了同情或共感的语言文字而说的。前者可以说是广义的文学，后者可以说是狭义的文学。不论是广义的文学也好，狭义的文学也好，都得和科学携携手。

有人说，“凡是科学的人们，因为精细地钻研着一点有限的视野，便决不能和博大的文人的感得全人间世的精神相通。”这话很有道理。因为文学创作常常是作者的精神的炽烈的扩大，常常要靠着想像力，又常常是有意作夸张的表现，所以我们不能强求每一个科学的人，都要懂得文学。可是，我们却希望每一个弄文学的人，都得设法去拉紧科学的手；否则，鬼话连篇，对读者不能算负责任的。

大家都知道，地圆之说，是确立于十五世纪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环绕地球而航行一周以后；但却少有人知道，二千余年前的战国时代的墨子，早已经有地圆的假说了。请看墨子的《天志》篇：“今夫轮人操其规，将以度天下之圜与不圜也？曰：中吾规者谓之圜，不中吾规者谓之不圜。是以圜与不圜，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则圜法明矣。”这不特是地圆的假说，而且在物理学上、几何学上也有创见。所以，我说，墨子的思想中，有不少是进步的、科学的。

在这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还有人迷信鬼神。可是，孟子早就

告诉我们：“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

东汉时代的王充，对于鬼的有无，说得尤其透彻：“世谓人死为鬼，有知，能害人；试以物类验之，人死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何以验之？验之以物。人，物也；物，亦物也。物死不为鬼，人死何故独能为鬼？……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论衡·论死》）

其时佛教自西域传入中国，后来信奉的人渐多，到了齐梁间，更是风靡全国。信佛的人，都以为人死而神不能灭；只有范缜反对这种说法，作《神灭论》来责难他们。而梁武帝、曹思文、萧琛、沈约等，却作了《难灭神论》来反驳他；一时附和的人很多。神灭一事，成为当时思想界所热中讨论的问题。那时是梁代，对于那一批“难”《神灭论》的人，已有人笑他们的迂阔；想不到在一千多年后的今天，还有人相信人死可以再生，所以阿Q被押去枪毙的时候，也忘不了“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的那句名言。

虽然，古代文人的作品，有进步的、科学的一面；但也有迷信邪说的、糊涂的一面。这是因为古时科学知识不足，对于自然界变化多端的现象，不能用科学的原理去说明它，为了省事，便作种种的假设，归之于神的力量。而古代的一些帝王，又往往假借神权以统治人民；一些封建时代的文人，为了讨好帝王，更往往造作故事，以明帝王之受命于天，莫得拂逆——如唐杜光庭的《虬髯客传》便是借着侠士虬髯客，尚且知道敬避太宗，以见太宗是天降的真主，而劝那些想起兵造反的藩镇臣民，不要和“真命天子”来争衡。他说：“真人之兴也，非英雄所冀，况非英雄乎？”那用意是不难洞察明白的。

我们对于这一类的作品，只能当作神话故事或是寓言阅读，不可一味相信它。这样，我们读古人书，才不会被古人带着走。

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所以，除了应该拉紧自然科学的手之

外,更应该搀紧社会科学的手: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不必再加论列。“假使艺术(文学)创作者主观上反对艺术的功利主义,而努力制作他的唯美的艺术品:这件事本身也就是艺术反映社会生活的凭据。”(曹伯韩《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因为这已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使艺术(文学)与现实脱离关系了。

郁达夫的南游诗

1955年10月22日在新加坡南洋学会的演讲辞

郁达夫先生，是南洋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其余的四位发起人是许云樵先生，张礼千先生，姚楠先生，关楚璞先生），自从1945年9月17日在苏门答腊被日本宪兵杀害，到现在已足足十个年头了。今天，我来讲《郁达夫的南游诗》，算是对郁达夫先生遇难的纪念。

郁达夫先生，又是一代的文艺作家；历来的批评家和读者，大多以为他是一个“颓废派”的文人，这是只看到达夫先生的一面，而没有深一层了解达夫先生的看法。创造社的李初梨先生曾指出，达夫先生是“摩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郭沫若先生以为“这话最能够表达了达夫的实际”。他的《论郁达夫》一文，也曾有过这样的评语：“在创造社的初期，达夫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

这所谓“起了很大的作用”，主要的是指达夫先生的创作小说而言。至于他的日记、游记和诗，“那大胆的自我暴露”，也还不是一样的；而且因为形式上的便利，有时甚至还要暴露得更彻底，更积极！这“自我暴露”的发展，便是“伪装颓唐”之形式成。所以郭沫若先生又有这样的话：“他的缺点是身体太弱，似乎在二十几岁的时

候便有了肺结核(子瑜案:1933年达夫先生游南高峰诗有“病肺年来惯出家”之句可以为证),这使他不能胜任艰剧。还有一个或许也是缺点,是他自谦的心理发展到自我作践的地步。爱喝酒,爱吸香烟,生活没有秩序,愈不得志愈想伪装颓唐,到后来志气也就日见消磨,遇着什么棘手的事情,便萌退志。”达夫先生一生就从来没有得志过,“愈不得志愈想伪装颓唐”,于是便招来不少物议。然而“达夫在暴露自我这一方面虽然非常勇敢,但他在迎接外来的攻击上却非常的懦弱”。所以“他很感觉着孤独,有时甚至伤心。”因此,“他不得不纵情在醇酒妇人中,希望能找到暂时的寄托。”(见连士升先生《悼念郁达夫》一文)而“壮志消磨”,又时常表露在他的作品——特别是诗里。

达夫先生一生所作的诗,散见于国内外的报刊及他的文集中,大都已收入拙编《达夫诗词集》一书。现在只想跟诸位来谈谈他的南游诗。

达夫先生的南游诗,据拙编所收,七言律诗有《感怀》一首,《南天酒楼饯映霞》二首,《送映霞归国》一首,《赠韩槐準先生》一首,《中秋》一首,《无题》四首,《步胡迈原韵》一首,以及《乱离杂诗》十一首,此外,尚有《星洲闻杨云史先生之讣》一首(见1955年7月13日《星洲日报》李冰人先生作的《郁达夫的遗作和佚诗》一文),为拙编所未收;七言绝诗有《题悲鸿画梅》一首,《题赠郭氏嘉东椰园照后》一首,《赠郭小姐开菊开兰姊妹》一首,《题徐悲鸿为韩槐準作喜马拉雅山远眺图》一首,《题徐悲鸿赠韩槐準鸡竹图》一首,《止园饯送徐教授悲鸿席上偶成》一首,《题陈月秀女士庐山图》一首,大都是题画之作——此外,为拙编所未及收入的有《登檳城升旗山》二首;至于五言律诗,则只有《一九四二年星洲既陷厄苏岛困孤舟中所作》的一首。

在这寥寥三十余首的南游诗中,最早写成的一首大约是《感怀》:“六陵遥拜冬青树,笑掷乾坤再出家,铁有寒光消郁怒,集无名